

印度哲学与中国佛学文集

高杨 荆三隆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宗教文化普及丛书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高杨 荆三隆 著

宗教文化普及丛书

印度哲学与中国佛学文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高杨 荆三隆 著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印度哲学与中国佛学文集 / 荆三隆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0-350-5

I. 印... II. 荆... III. ①哲学-印度-文集②佛教-中国-文集 IV. ①B949.351-53②B3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02895号

印度哲学与中国佛学文集

高 杨 荆三隆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47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史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2插页 195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80680-350-5/B·2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21)



前 言

本书是由家严，原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杨先生在生前发表的与印度哲学相关的八篇论文和笔者在有关学术会议、刊物中发表的十六篇与中国佛学相关的论文组成。

在编排、采选上大体以论文完成或发表的先后时间排序，冀以表明两代人在研究方向上的传承关系。高杨先生不仅是我的严师慈父，同时还是我心灵的引导者，使我一个原本生性疏懒、散漫，浅薄、鲁直的汉子，在不经意之间，居然列于学人之中。从战士、工人到大学教授，父亲对我在思想和学术研究上的影响一直延续着。将家父生前发表的与印度哲学相关的论文汇集成册，是近年来的一个心愿，续上一些自己在佛学研究中发表的文章，可以为今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一些翻检的便利。希望能进一步促使自己总结经验，有所增益，并得到读者和方家的指教。

荆三隆写于2005年春节

作者简介

高杨(1925--1988)原名荆又新, 山西安邑人。194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 曾任北师大第一届学生会总理事、新诗社社长。1950年由中央教育部调西北大学, 任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熟悉俄、英、日、德、巴利、梵等多种文字, 指导过印度佛教史、哲学史、古籍整理等学科的研究, 参加过中华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宗教卷的撰写工作。已出版的遗著有《佛教起源论》《金刚经新注》《印度哲学与佛学》《印度哲学与中国佛学文集》。

荆三隆, 1955年出生于西安市。1979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师事高杨先生研习印度哲学; 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长安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撰著、合著有《儒释思想比较研究》《儒佛道三家名言品鉴》《圆觉经注译与评说》《白话楞伽经》等12部(不包括两本台湾修订本), 参撰、参编著述、教材20余部, 发表论文30余篇。

目 录

前言	
一、唐初政治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1
二、论早期瑜伽派的学说及其特点	34
三、试论弥曼差派的学说及其体系中的矛盾	43
四、论早期胜论派的学说	55
五、试论经量部的学说	77
六、原始佛教的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88
七、论正理派的十六句义	99
八、《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补证	124
九、《大唐西域记》研究初探	157
十、谈佛教文化研究的走向	162
十一、初论释老“法”“道”概念的界定	168
十二、武刹文葩相映红——少林文化撷英	178
十三、浅论早期佛教与唯物主义的论争	183
十四、辨析佛教“苦谛”说	192
十五、论初期的大乘佛教及其学说	196
十六、佛陀及其生平考辩	204
十七、玄奘与大乘瑜伽行派	214
十八、大乘般若经与玄奘的贡献	230
十九、玄奘与佛教政事观及现实意义初探	238

二十、弘扬律学传统 教化参悟人生	249
二十一、从《圆觉经》《楞严经》看文殊思想 在佛学中的地位	256
二十二、隋唐时期的中印文化关系	269
二十三、菩提达摩付法的思想价值与现实 意义管窥	277
二十四、《楞严经》色阴十禅境探究	285
后记	302

一、唐初政治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列宁在《论国家》中曾经指出：

“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①

根据列宁的这一教导,去分析、研究唐初政治与佛教的关系,特别是与《大唐西域记》的关系,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将涉及当前史学研究中争论的许多问题。这里仅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隋末,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摧垮了隋王朝的统治及其由官僚、军队和僧侣集团组成的全部庞大的封建专制的国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7页。

家机器,严重地打击了豪族地主阶级的气焰,使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以李渊父子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的豪族地主乘机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又重新建立起以关陇集团为中心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

但是,唐王朝是在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唐初武德、贞观的三十余年中,李唐统治阶级不得不同时在下列各个方面进行激烈的斗争:镇压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各地称王称帝的地主集团的武装进行对全国统治权的争夺;征伐边疆少数民族贵族集团的叛乱;对宗室内部觊觎皇位的贵族进行无情的剪伐。这种情况形成了唐初政治上的一些不同于前代的特点。

关陇豪族地主阶级是李唐王朝的领导力量,这一点可从当时掌握政权的组成成分得到说明。如武德、贞观两朝的宰相中,除唐王朝的宗室及少数中小地主的代表与部分出身于行伍者外,其余绝大部分皆出身于豪门高第^①。但绝不能因此就可以说唐初政权的性质是豪族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因为除关陇集团的豪族地主阶级由于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新的李唐王朝以外,其它各地的豪族世家则因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社会动荡和隋末农民起义的扫荡,多已凋零殆尽。那些山东豪门在唐初虽已名存实亡,却仍标榜门第,借以“窃货”,从而受到唐王朝统治者的极端鄙夷。李世民就曾说过:

① 王溥:《唐会要》卷一载:

高祖时宰相 16 人:秦王、裴寂、刘文静、肖瑀、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高士廉、齐王元吉、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

太宗时宰相 29 人:裴寂、肖瑀、陈叔达、李靖、封德彝、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高士廉、温彦博、岑文本、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戴胄、刘洎、李世勣、张亮、马周、褚遂良、崔仁师、杨宏礼、王珪、杜淹、杨恭仁、许敬宗、高季辅、张行成。

“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大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既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青梁之胄，不敦匹敌之仪。而名惟在于窃货，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宦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乎婚媾。多纳财货，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夸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惟此弊风，未能尽废。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①

旧的家世豪门的没落，给李渊父子为代表的关陇豪族地主以特殊的优越地位，并把剪除其他豪族世家作为其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于是那种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政策与巩固这一政策的府兵制的实行，就反映了李唐王朝政权的基本性质，从而“固本弱枝”的政治学说也就应运而起。陆贽云：

“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州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②

这一点也反映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所谓“要荒为枝叶，畿内乃根本”^③、“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④，唐初统治者及其主要僚佐的这种“固本弱枝”的观念就成为当时制定政策的主导思想。

李渊深知关陇豪族是他创立王朝的基本力量，因而既登皇位，就下诏云：

① 《全唐文》卷六，《刊正氏族诏》。

② 《陆宣公奏议·论关中的事宜状》

③ 李世民：《金镜》，《全唐文》卷十。

④ 李大亮：《请停招慰突厥诏》，《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

“义师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余绪，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思后时，扼腕连轭，争求立效。糜之好爵，以永今朝。”^①

与此同时，他又极力拉拢前隋公卿贵族以及中小地主作为巩固新王朝的羽翼，如：

“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绝。历数有归，实维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前隋蔡王智积等子孙，并付所司，量才选用。”^②

“其隋代公卿以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田宅，并勿追收。其有穷困，粮食交绝，具录名簿，速加赈贍。”^③

虽然在武德年间也曾注意到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甚至对有功徒隶也准从本色授官^④，但从武德年间唐王朝政权的性质来说，仍然是以关陇集团为中心的豪族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当时尚未扩大到整个地主阶级的专政。这是武德年间与贞观年间政权性质的不同之处，这一点论者多未言及，实际上是研究唐初政治的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如不提出，则难以说明前代史官关于论述李渊“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⑤以及武德时期各种政策的症结所在。

武德时期虽然也照顾到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决不因此就稍微影响到其以关陇集团为中心的豪族大地主阶级专政的性质。固然武德七年“均田制”的实行有利于中小地主及自耕农的发展，但这是由于当时的情况所迫和皇室及其统治机构赖以维持的需要。试以当时全国户口数字的情况来看，就可以了解实

① 《授三秦豪杰等官教》，《全唐文》卷一。

② 《选用前隋蔡王智积等子孙诏》，《全唐文》卷一。

③ 《加恩隋公卿民庶诏》，《全唐文》卷一。

④ 《徒隶等准从本色授官诏》，《全唐文》卷一。

⑤ 《旧唐书·高祖本纪》后附史臣论语。

行“均田制”的历史背景。

“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贸易妻子，奔波道路，虽加周给，无救倒悬。”^①

隋开皇中户总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②。户口的增殖在短期中是难以实现的，经武德到贞观全国户口总数仅三百万，直至一百三十余年后的天宝末年才达到隋时户口的总数^③。即使这样，早在武德二年实行租庸调法时却已把全部租税的重担压在了中小地主及自耕农的头上，其他穷苦农民遭受残酷剥削的情况自不待言。

小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王室、官僚赖以生存的基础，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赋税，因之租庸调法和“均田制”的并行乃是维护李唐王朝存在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对自耕农的让步。马克思就指出：

“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小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④

这点既适用于武德时期，也适用于“贞观之治”及其他封建统治时期。如果参看唐初制定的礼乐和刑法，就更可清楚地认识自春秋以来历代统治阶级政治的实质。“礼”与“刑”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专政所体现的形式和内容，所谓“礼”，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大经”^⑤和封建帝王手中的“大柄”^⑥，亦即“杀生之制也”^⑦，其内容则是“刑、罚、威、狱”，其目的是“使民

① 李渊：《定户口令》，《全唐文》卷一。

② 杜佑：《通典》卷二。

③ 《通典》卷七。

④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1页。

⑤ 《左传·昭公十五年》

⑥ 《礼记·礼运》

⑦ 《韩非子·八经》

畏忌”^①。虽然武德年间也曾颁布过所谓“宽大之令”，特别是贞观时期颁布的许多“恩诏”，曾博得了许多旧史学家的赞美，但对我们来说，却不应忘记恩格斯所说的两段话：

“虽然恩诏也是对革命运动的让步，但是就其意图来说，则是背信政策的圆滑手段之一……只要更仔细地阅读一下这个文件，它的背信性质就显得十分清楚，巧妙的手法就变成了透顶的荒唐，变成政府对革命运动无计可施和无力应付的证据。”^②

“但是每个新的让步不仅不能安抚皇帝的臣民，反而会由于它那无法掩盖的虚伪性而愈来愈使他们愤怒。”^②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李渊传位李世民，此后即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改革。“玄武门之变”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两种政治主张、两种派别斗争的表现。建成、元吉一派代表关陇豪族大地主集团的利益，而世民一派则代表了包括中小地主阶级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世民的一派主张从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制订并推行各种政策，从而能够赢得整个地主阶级的支持，加强并相对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促成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相对的荣盛。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除初期及衰落的末期另当别论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凡比较荣盛的时期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整个地主阶级专政的特点；反之如果仅只代表豪族大地主阶级利益或某一政治集团利益的专政，无不失败或迅速地覆灭。

李世民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政治和军事生活使他能较多地接触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既要镇压农民起义，又得和各种政治和军事集团进行频

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② ③ 《奥地利革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49、252页。

繁的斗争过程中,使他必须更多地依靠他的幕僚和他的士兵,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较实际地对待各种问题。通过实际的斗争,使他逐步形成了他的政治观点。这就是说为了取得最高的统治权并巩固这种统治,单单依靠他的关陇豪族大地主阶级是不行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吸收中小地主的力量,形成一个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才可以对付得了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人民。这种政治观点是他制订一切政策的基础。他的政治观点归纳起来,就是调动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以维护王朝的统治,在任人施政方面必须兼顾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力量与利益,在政权中必须扩大范围,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曾用韵文的形式暗示过:

“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①

形成这一施政主导方针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民可畏论”。这是他长期与农民起义斗争的经验总结,他也常和他的左右谈到这个问题,如:

“天子者,有道则民推而为主,无道则民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②

“魏征上疏曰:……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③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④

基于这种认识,他不得不经常注意农民的脉搏,督促他的僚佐提醒他要“居安思危”,以免覆舟之患。如:

① 《小池赋》,《全唐文》卷四。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③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④ 《贞观政要》卷四,《教戒》。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①

“十五年，太宗问守天下难易？魏征曰：……居安思危……安而能惧，岂不为难？”^②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致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③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岑文本在贞观十一年上封事中的一段话：

“今虽亿兆乂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敝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燹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纪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片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④

竭泽而渔的办法无法巩固统治阶级的长期统治，这一点历代统治阶级也是十分清楚的。唐王朝统治者所说的“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也正是这个道理。从地主阶级长期统治的要求出发，避免覆舟之祸的发生，使人民有“滋息”的可能，这就是史家常言的“让步”。实际上只要我们正视历史中的事实，并对上述引文仔细考察一番就可看出，所谓“让步政策”也者，不过是史家好心的幻想而已。

①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② 《贞观政要》卷二，《政体》。

③ 《贞观政要》卷二，《政体》。

④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

在贞观政权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方面，也体现了李世民“兼容并蓄”的施政方针。他的主要僚佐的阶级成分较之武德时期范围扩大了，吸收了许多中小地主的代表和出身“微贱”的武人。旧史家所津津乐道的“任贤”，实际上只不过是意味着任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贤”，其中主要的是任中小地主阶级之“贤”。关于这一点，程祜曾经说过：

“观其任王珪、魏征于仇讎，任张亮、李百药于降虏，起刘洎、马周于疏远，起张玄素、孙伏伽予耆旧，委之以政，责之以功，谏无不从，谋无不获。”^①

虽然李世民在用人方面的这种“兼容并蓄”的政策也曾受到当时关陇豪族地主阶级的反对，如长孙无忌就曾十分仇视王珪、魏征^②，但他从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继续推行他的政策。在这方面，从他未登皇位时起就开始留意了，那时协助他推行此项政策的是房玄龄。

“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③

甚至有时李世民也把“择官任贤”作为治政之本：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世民的主要僚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隋末王通的门生。王通创立了当时十分活跃的河汾学派，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许多不满于杨隋王朝统治的地主阶级中的各个阶层的青年学子，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学术为幌子的在野的政治集团。其中很多成员以后成为唐王朝政权中的高级官僚。曾为贞

①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注评。

②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云：“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讎。”

③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④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

观期间宰相的杜淹就说过：

“河南董恒、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玄、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钜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余人。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之间，雍雍如也。”^①

王通的政治学说，一言以蔽之曰“中道”，按其实质亦即地主阶级中间等级的利益反映，是地主阶级中各阶层利益的调和与折中。这种学说对唐初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李世民的兼容并蓄的政治思想是王通政治思想的扩充与发展。特别是王通在对儒、道、佛三教的“均衡并存论”，对唐初的宗教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不仅如此，王通的政治思想及其对三教的主张对中唐诸家的思想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柳宗元的“三教调和论”影响尤巨。

贞观中，一切政策既已体现了王通的许多思想，但一些人尚感到王通的思想还未能充分体现，从政治上说也就是尚认为对地主阶级中各个阶层的利益还未充分照顾，所以王福畴说：

“太宗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时，后进君子鲜克知之。”^②

房、魏未娴王通政论的核心——“礼”，因而引起福畴的感慨，这一点福畴应该说是抓住问题的实质了。

上述种种为我们具体研究贞观政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还应指出，决定贞观政治的基本原因还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和阶级斗争的状况。离开当时的客观实际是无法分析贞观政治的特点的。从这点出发，具体分析，可以发现贞观政治在前后不同时期是不尽相同的。

① 《文中子世家》，《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五。

②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全唐文》卷四百一。